



東·亞·文·化·46

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学界晚清政治史研究的新趋向

李 细 珠

- 一、革命史研究的淡化与边缘化
- 二、改革史研究的细化与深化
- 三、制度史研究的加强
- 四、几个新的研究趋向

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学界晚清政治史研究的新趋向

李 细 珠*

中国大陆学界的“中国近代史”概念，现在已基本上公认为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40—1949年）这110年的历史，即是晚清史加民国史。晚清政治史向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点内容，经过20世纪的风雨历程，业已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而成熟的分支学科。上个世纪末，姜涛先生曾经就1949—1999年50年间的晚清政治史研究做了系统的评述，¹⁾总结了以往研究的得失利弊，明确了该学科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新世纪以来，随着近代史研究的重心逐渐下移与社会文化史等新学科的勃兴，晚清政治史的研究逐渐有所冷落。同时，又因为晚清政治史研究已相对成熟而起点较高，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实属不易。即使如此，晚清政治史研究仍不断有所发展。本文拟对新世纪以来晚清政治史研究的最新进展略做述评，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革命史研究的淡化与边缘化

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运动，曾经以“三次革命高潮”为名，不仅是晚清政治史而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核心内容。

* 中國社會科學院 近代史研究所 教授。

1) 姜涛：《50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近年来,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与研究方法的更新,关于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研究,也在逐渐由政治史向社会史、文化史等研究领域渗透与扩展,为认识这些重要的政治事件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 关于太平天国与咸同政局研究

清史编纂是新时代一项令人瞩目的浩大文化工程。如何处理太平天国在新修清史中的位置,无疑是清史编纂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不仅涉及到太平天国历史地位的评价,而且关系到新时代有关农民战争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章开沅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一次农民战争,对清王朝的衰亡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在清史编纂工程中应将其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给以足够充分的客观陈述。从总体上说,太平天国运动是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交相激化的结果。就其是非而言,民众反抗清朝的暴虐统治,即可肯定其为“是”;就其功过判断,太平天国之功主要表现在对清朝统治的勇敢挑战和沉重打击,影响不仅表现于当时而且更为彰显于事后。在清史编纂工程中,对于太平天国的功过应作实事求是的客观陈述,既不溢美,也不苛求。²⁾

太平天国以宗教起事,以宗教行军理政,因而不了解其宗教,对太平天国的很多问题都无法得到清晰地认识。夏春涛新著《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对太平天国宗教的名称,上帝教与基督教、儒家传统思想文化及中国民间宗教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并对天京事变、太平天国败亡等原因作了深入剖析;还对流行的太平天国实现了妇女平等以及近来出现的太平天国邪教说进行了辨正³⁾。

高层领导之间的内部矛盾,是太平天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的矛盾更是其中心环节。以往学界对洪、杨矛盾的

2) 章开沅:《从清史编纂看太平天国》,载《江海学刊》2006年第6期。

3) 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

研究,几乎均集中在定都天京之后。吴彤具体考察了太平天国运动初期洪、杨之间一系列争夺权力的矛盾斗争,以弥补这个薄弱环节。⁴⁾王明前则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政治分化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格局。认为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在天京事变之后逐步分化为中央宫廷贵族与地方军事贵族两个利益集团,这种政治分野,使太平天国高层领导人之间的裂痕无法弥补。同时,清廷则大胆放权给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实力集团,逐步实现了政治军事力量的整合。此消彼长,直接制约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进程⁵⁾。

王明前关于太平天国政权统治下的农村政治的研究亦有新意。关于太平天国前期农村政治,王明前探讨了“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及其相关问题,认为“照旧交粮纳税”政策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随着西征的展开和政治方式的转变,很自然采取的社会经济政策,与《天朝田亩制度》实施与否并无直接联系。⁶⁾王明前还具体研究了苏州三县、常熟和江西的农村政治实情⁷⁾。

对太平天国北伐战争史研究中颇为关注的是否用强制性的“裹胁”手段补充兵员问题,池子华、崔岷认为,北伐军确实存在强掳百姓从军的问题,北伐军之所以采取“裹胁”手段补充兵员是由北伐军自身、群众和清政府三方面的主客观因素交织作用决定的。“裹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不断消耗而引起的兵力不足问题,但单纯的人数增加并没有提高北伐军整体的战斗素质,反而在部分群众中造成恶劣的影响,北伐军

4) 吴彤:《论太平天国运动初期的洪、杨矛盾》,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3期。

5) 王明前:《太平天国后期中央宫廷贵族与地方军事贵族的政治分野》,载《江淮论坛》2005年第2期。

6) 王明前:《太平天国前期农村政治二题》,载《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4期。

7) 王明前:《太平天国苏州三县农村政治研究》,载《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太平天国常熟县农村政治研究》,载《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太平天国江西农村政治研究》,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最终败亡，与“裹胁”不无关系⁸⁾。

还有一些具体的考证性研究成果值得注意。《天朝田亩制度》历来被视为太平天国主张平均分配土地，使耕者有其田，反映农民土地要求的农民革命纲领。王国平通过考察太平天国起义酝酿过程的宣传活动及其主张，探析上帝教的教义，并与中国历史上曾使农民获得私有土地的均田制比较，认为所谓“平均分配土地”其实是对《天朝田亩制度》的误解⁹⁾。欧阳跃峰对所谓太平天国实施了“圣库制度”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太平天国的生活必需品供给方式不应称为“圣库制度”；用国库来解释圣库是不妥的，说国库来源于圣库亦纯属推测¹⁰⁾。关于天京事变的日期，以往的研究者都以洪秀全于《颁行历书》中所说“七月二十七日”是东王升天节”，认定9月2日是天京事变和东王杨秀清被杀的日期。张光荣通过考证认为，所谓9月2日东王升天节只是洪秀全编造的骗局，杨秀清并不是在9月2日凌晨被杀，天京事变应发生在9月4日至5日。¹¹⁾

关于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相关的边缘研究的倾向很明显。董丛林考察了太平天国时期的谶谣现象，认为谶谣盛行是太平天国时期神秘政治文化现象的明显表征之一。谶谣的流布与盛行，固然与当时战乱之下社会动荡、人心惶惑、迷信氛围浓烈的环境条件密不可分，同时也是清朝政府与太平天国在一定程度上自觉利用谶谣作为特殊的舆论武器的结果¹²⁾。廖胜则从民俗的角度探讨了太平天国妇女自由问题，认为太平天国妇女的自由风尚，主要源于广西客家和壮族妇女的习俗以及宗教等因素，并不是由于太平天国采取了解放妇女的主观措施¹³⁾。

上海小刀会起义与太平天国的关系曾受到学界一定程度的关注。但

8) 池子华、崔岷：《北伐太平军“裹胁”问题述论》，载《历史档案》2001年第3期。

9) 王国平：《〈天朝田亩制度〉新议》，载《江海学刊》2005年第1期。

10) 欧阳跃峰：《“圣库制度”考辨》，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

11) 张光荣：《天京事变日期考》，载《复旦学报》2002年第1期。

12) 董丛林：《有关太平天国的谶谣现象解析》，载《安徽史学》2003年第1期。

13) 廖胜：《太平天国妇女自由问题之民俗释论——兼论妇女自由不能作为太平天国妇女解放之论据》，载《史学集刊》2005年第4期。

是，对于小刀会起义在酝酿阶段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学者们关注不够。朱从兵撰文认为，上海小刀会在酝酿起义阶段与太平军之间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实质性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为双方约定了起义的日期、地点与起义后的军事进攻战略，太平军还有可能派人参与了起义的酝酿¹⁴⁾。

与太平天国运动相关的捻军史的研究，有郭豫明著《捻军史》一书，值得重视。该书利用丰富的史料，对于捻军起义的时代背景、捻党的产生及其起义的酝酿准备与爆发、捻军起义的发展进程及其与太平军联合作战、捻军的余部与后代的继续斗争等方面，均作了详细的史实梳理，在此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捻军起义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并阐明了捻军起义的性质和历史意义¹⁵⁾。

关于晚清重要政治人物与政局的研究。朱东安在长期研究曾国藩、曾国藩幕府的基础上，推出新著《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系统地论述了曾国藩集团崛起的历史背景、形成过程、内部结构、与清政府的关系及其对近代中国政治的影响等问题。以往对曾国藩集团的研究，多局限于个别人物或某一侧面，该书则通过对晚清咸同时期太平天国、清政府及曾国藩集团三方国内主要政治势力的综合考察与研究，从而对曾国藩集团崛起的主客观条件及其对近代中国政治的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¹⁶⁾。高中华《肃顺与咸丰政局》¹⁷⁾一书，是第一部系统论析肃顺生平思想活动及其在晚清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著作，弥补了晚清人物研究的某种缺佚，也从一个侧面丰富和深化了学术界对晚清政局的认识。

(二) 关于义和团与庚子政局研究

14) 朱从兵：《上海小刀会起义的酝酿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初探》，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15) 郭豫明：《捻军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

16) 朱东安：《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华文出版社2003年1月版。

17) 高中华：《肃顺与咸丰政局》，齐鲁书社2005年9月版。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问题，以往的研究者大都认识到其起源的区域性和组织的多元性，但对于这两者之间是如何沟通的这个问题的认识尚不够深入。程歊从社会史的角度，通过对山东冠县梨园屯玉皇庙教案口述史料的研究，对此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乡村社区精英群在应对外国教会权力挑战的过程中，通过跨区域的横向联合和对区域性的民间文化的再创造，重塑了各自主导的那部分组织和文化，形成了主要来自于教派文化和民俗文化而又区别于既往民间组织和民众运动的三大标帜：一是“同心义和”的价值观和基层体制内外的组织联合反洋教的结盟形式（来自冠威义和拳）；二是降神附体的群体仪式（来自鲁西北神拳）；三是“刀枪不入”的表演手段（来自鲁西南大刀会特别是大刀会内功的形式化）。三个标帜将多中心、区域化的民众反洋教集团联结为一个运动——义和团运动¹⁸⁾。路遥则具体考察了直隶、北京义和团中的民间秘密教门组织及其活动，认为义和团虽以民间秘密教门为依托，但不应把这场运动视为是一场宗教战争¹⁹⁾。

庚子年(1900年)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多种政治事件交相迭起，政局波谲云诡。相对于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和东南互保来说，庚子勤王运动的研究显得很薄弱。桑兵在长期进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将相关研究成果集结为《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²⁰⁾一书，是近年来近代史学界兴起的考证史学的重要著作。“庚子勤王”是戊戌政变之后，影响晚清政局的重要历史事件。由于康有为等人有意掩盖事实，故意留下虚假记载，以往有关著述多有误解，以为唐才常与自立军为勤王的主力。该书从多角度对庚子勤王问题加以周详地阐释，深入分析趋新各派以及海外华侨、外国来华势力、地方督抚、秘密社会之

18) 程歊：《社区精英群的联合和行动——对梨园屯一段口述史料的解说》，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19) 路遥：《义和团运动发展阶段中的民间秘密教门》，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20) 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

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确证了以康有为为主导的保皇会在庚子勤王这一晚清政局的重要事件中的历史作用，细致描述了保皇会的组织状况、活动过程及结果，全面、生动地阐释了庚子勤王运动之于晚清政局变化的深刻影响。在作者看来，庚子勤王的影响要远大于在通史书写序列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义和团运动。不仅显示了士大夫阶层在朝廷与社稷之间的两难取舍，更由于动员范围还包括全球的华侨华人，引起了全球华人的民族和群体意识的首次觉醒。

（三）关于辛亥革命与光宣政局研究

2001年是辛亥革命90周年的纪念年，有两套出版物值得注意：一是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孙中山研究所出版了一套“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学术系列”（八种）；二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一套研究辛亥革命的著作（五种）。这是国内两个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相关学术成果的集中展示。

辛亥革命是研究起点颇高而难以突破的领域。朱月白从民族认同和近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视角，探讨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认为辛亥革命在形式上将中国从封建王朝中解放出来，代之以崭新的共和国形式，中国社会自此开始从形式和内容上向现代性的转变，其意义不能低估。民族国家是近代新出现的国家形式，建立民族国家是近代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在此过程中，经历了从排满到五族共和的曲折，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民族认同与现代的“民族意识”的建立。辛亥革命的意义不在于破坏旧秩序，而在于它能否以民族国家的形式使中国进入现代国家之林，从而将中国的抗争汇入到20世纪世界的民族独立运动的潮流，将中国变成世界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看，辛亥革命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²¹⁾。

21) 朱月白：《从朝代之国走向民族之国——辛亥革命与民族认同感的建立》，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同盟会与北洋集团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政坛崛起的两支新的政治力量。张华腾撰文论述了同盟会与北洋集团的关系，认为从阶级立场的角度来说，这两支力量是互为对立的政治力量，同盟会以推翻清政府为志，北洋集团则以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为责。但在社会的发展和改造方面，二者又有着某种程度的统一性。在清末极其复杂的社会矛盾运动中，武昌起义促使这两支政治力量携手结为政治同盟，共同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起全国统一的中华民国政权²²⁾。

1901至1905年的拒俄运动，在近代中国史上有着分水岭式的重要地位。在此过程中，趋新人士与广大民众在近代革新救亡努力中从长期的分离状态，逐渐趋向合为一体，其中重要的一环，则是所谓“中等社会”的自觉。桑兵认为，拒俄运动使学生和开明士绅直接面对国民的社会责任，中等社会的主张部分得到实现，四民合为国民，而中等社会起着引导及核心作用。此后，提出“中等社会”的激进人士较少继续使用这一概念来看待自己与民众的关系，而主张体制内变革的立宪派士绅则有所发挥，中等社会的概念被广泛运用²³⁾。

关于辛亥革命时期人物的研究。章开沅通过具体考察立宪派代表人物张謇与汤寿潜的交谊关系，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东南地区和东南精英在全国政局变化中已经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其总体实力还不足以一举取代北方的传统政治中心地位，而在实际上主导社会潮流的东南精英乃是半新不旧的过渡时代英雄，所以辛亥革命只有以南北妥协宣告结束²⁴⁾。陶水木则着重探讨了辛亥革命时期有关汤寿潜的几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²⁵⁾。张礼恒撰文指出，辛亥革命期间伍廷芳与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合作至疏远的过程。伍廷芳之所以投向

22) 张华腾：《对立中的统一：辛亥革命前后同盟会、北洋集团关系述论》，载《江海学刊》2006年第1期。

23) 桑兵：《拒俄运动与中等社会的自觉》，载《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24) 章开沅：《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25) 陶水木：《辛亥革命时期汤寿潜几个问题的探讨》，载《民国档案》2005年第1期。

革命，既是革命党人主动邀请的结果，也有其自身的政治信念等方面的原因，双方的合作，加速了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但在实施治国方案问题上，双方存在分歧，并最终导致了双方关系的疏远²⁶⁾。梁士诒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人物，但以往的相关研究不多。李英铨、马翠兰进行专题研究，论述了梁士诒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和作用²⁷⁾。肃亲王善耆在晚清亲贵中以开明著称，辛亥革命时期，他和革命党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重要而又不被重视的问题。薛瑞汉撰文探讨了善耆与革命党人的关系，认为善耆对革命党持宽容之政见，其主动接近民党，关心宪政，均思缓和革命，希望以此缓和国内矛盾，挽救清王朝岌岌可危的统治，但在客观上便利了革命运动的开展。²⁸⁾

辛亥革命的研究也有向社会史领域拓展的趋势。李细珠以著名的秋瑾案为例，探讨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的互动关系，为观察晚清政治与社会变迁等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²⁹⁾ 杨鹏程根据《湘鄂米案电存》等重要资料，从灾害学、社会学的角度研究长沙抢米风潮中官、绅、民三者所扮演的角色及互动关系，认为这场严重的社会冲突其结局是官、绅、民三输，这是清王朝统治迅速走向崩溃的重要表征³⁰⁾。沈渭滨撰文认为，辛亥革命为东南地区的社会转型提供了契机。从东南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看，辛亥革命对社会转型的界标意义，明显超过1840年的鸦片战争，因而可视为中国近代史的真实起点³¹⁾。

辛亥革命研究的深入有待于区域研究和个案研究的进一步开展。胡

26) 张礼恒：《论辛亥革命期间伍廷芳与革命党人的关系》，载《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

27) 李英铨、马翠兰：《论辛亥革命中的梁士诒》，载《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2期。

28) 薛瑞汉：《善耆与革命党人关系初探》，载《中州学刊》2006年第6期。

29) 李细珠：《清末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之互动关系——以张曾扬与秋瑾案为例》，载《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

30) 杨鹏程：《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民》，载《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

31) 沈渭滨：《论辛亥革命与东南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兼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载《复旦学报》2002年第2期。

国枢的《光复会与浙江辛亥革命》一书，是辛亥革命在浙江的区域研究与光复会个案研究相结合的重要著作。该书详细系统地考察了浙江辛亥革命的历史过程、光复会的组织建构及其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贡献，对于浙江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以及光复会在辛亥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给予了客观公允的评价，弥补了学术界以往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³²⁾。

有关光绪皇帝的死因，历来众说纷纭。近代以来不少笔记、野史认为系遭谋害而死。马忠文认为，对此，还是需要依据可信的材料，特别是像清宫档案以及当事人的日记、信札等原始文献来综合考察。他利用时任军机大臣鹿传霖、军机章京许宝蘅以及内阁侍读学士恽毓鼎等人传世的日记。进一步考证了光绪、慈禧之死的种种迹象，认为光绪帝应系病死无疑³³⁾。最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正式公布《清光绪帝死因研究报告》³⁴⁾ 宣称：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这是中央电视台清史纪录片摄制组、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等单位13位专家组成的“清光绪帝死因”专项研究课题组，以光绪皇帝墓葬中的头发、遗骸、衣物等为样品，历时五年反复检验和研究而得出的结论。

二、改革史研究的細化与深化

严格说来，晚清改革史的起点至少应该从洋务运动算起。但是，因为洋务运动时期的变革主要在技术层面与经济领域，而且一直是晚清经济史研究的重点，故本文拟着重介绍有关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和清末新

32) 胡国枢：《光复会与浙江辛亥革命》，杭州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33) 马忠文：《时人日记中的光绪、慈禧之死》，载《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34) 据中华文史网(<http://www.qinghistory.cn>)；又载《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

政的研究成果。随着现代化范式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晚清改革史的研究亦备受学界关注，并有渐成细化与深化之势。

（一）关于戊戌变法研究

戊戌变法是晚清政治史研究的老课题，茅海建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最为引人注目。他的新著《戊戌变法史事考》³⁵⁾，是这方面成果的初步集结。作者充分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大量档案材料，完成了一些重大史实的精心考证与重要场景的细密描述：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中下层官员与民众对变法的建策；张之洞调京主持朝政与机会错失；光绪皇帝的对外观念；日本政府的观察与反应。旧说的认知、补证与修正，新说的展开、论证与建立，充分证明了作者刻意追求的所谓“史实重建”的学术宗旨。稍后，茅海建又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新作。其一是《救时的偏方：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中军事外交论》。据茅海建统计，在戊戌变法期间大约六个多月的时间里，司员士民共有457人次至少递交了567件上书，现存275件上书的原件和抄件。他认为，这些司员士民在上书中提出的军事、外交上的诸策，与历史发展的方向并不吻合，有些地方甚至背道而驰，其实大多为“救时的偏方”³⁶⁾。其二是《“公车上书”考证补》³⁷⁾。“公车上书”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作者通过重新审视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认为其实有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一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其三是《戊戌变法期间的保举》，通过系统考察甲午战争以后整个保举的情形，尤其

35)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店2005年1月

36) 茅海建：《救时的偏方：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中军事外交论》，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

37) 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补》，连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4期。

是清廷官员对康、梁等人的保举，由此观察康、梁派的政治活动及其企图，以及当时的政治实情³⁸⁾。

尽管学界对康有为、梁启超涂饰史料以神话历史的行为早有察觉，并多有揭露，但今人对戊戌变法史的整体理解，从主流上讲，依然未能摆脱康梁话语系统的基调；而康有为自编年谱与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相表里，实为支撑这种话语系统下戊戌变法史叙述框架的核心文献。戚学民详细探究了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初版九卷本的成书过程，重点考察了该书两个组成部分（新政“本末”与政变“原委”）的主要观点或基本结构的形成、变化和定型的过程。认为此书与康梁师徒1898年末至1899年初流亡日本时的政治活动密切相关，书中有关戊戌变法的宏观陈述和关键细节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作者政治活动与当时舆论的影响，经过作者的刻意安排。《戊戌政变记》一书“实为康梁应急的政治宣传品，而非纪实的信史”³⁹⁾。关于康有为自编年谱成书的时间，学界通常认为撰写于1899年初，康氏自己还有起稿于乙未(1895年)的说法。马忠文通过研究与分析认为，所谓从乙未年开始撰写年谱的说法并不可靠；年谱的主体内容撰写于1899年初，大致无疑问，但此后康氏对年谱仍有修订和增删，将其视为康逝世前定稿，可能更为合理一些。把年谱看作1927年时康氏内心世界与思想状态的反映，应该是相对准确的⁴⁰⁾。学者已经注意到康氏自编年谱中对其戊子年(光绪十四年，1888)赴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情形的记载有疏漏之处，但究竟康有为是怎样“作伪”的，张勇撰文做了新的探究。他认为，康有为的记述含混其辞，将两次应试并作一谈，其本意或只在遮掩连续两次落第之差，而略施移花接木的障眼技法；然而却既障人又自陷，给后人留下“作伪”的把柄⁴¹⁾。茅海建根据《我史》的手稿本(题名为“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

38) 茅海建：《戊戌变法期间的保举》，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

39) 戚学民：《〈戊戌政变记〉的主题及其与时事的关系》，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

40) 马忠文：《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成书时间及相关问题》，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1961年由康有为弟子罗孝高（普）的后裔罗静宜、罗晓虹捐赠），对《我史》的书名、写作时间及其各抄本与刊本的关系进行了考订，大体可确定其光绪二十四年末的写作时间，也认定各抄本、刊本在文字上与“手稿本”并无大的差异。该文又对“手稿本”上康有为本人的修改进行了辨认，发现《我史》已经过康有为事后的修改，内容有了不小的变化，其中《民功篇》应写于光绪十三年，《人类公理》、《公理书》属后来的添加，而大同的思想、诸天讲的思想也属后来的添加。⁴²⁾ 毕永年的《诡谋直纪》被发现后，一直被认为是康梁维新派“围园”密谋的权威资料。房德邻利用清廷戊戌年八月十四日谕旨、袁世凯《戊戌日记》和康有为《自编年谱》等资料，认定康有为等确实有利用袁世凯兵围颐和园的计划，并对毕永年的《诡谋直纪》的真实可信度提出质疑，认为《诡谋直纪》将维新派兵围颐和园的密谋推前到八月初一日以前，这与当时的形势和维新派的活动不相符合，当是毕永年根据他在八月初三日甚至戊戌政变后听到的密谋事而编写的。⁴³⁾ 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也是戊戌变法史研究中聚讼纷纭的疑案。关于“告密”的时间是八月初四日还是初五日，地点是北京还是天津，对象是奕劻还是荣禄，以及“告密”与戊戌政变发生的关系等问题，均未有定论。刘路生针对郭卫东所谓袁世凯八月初四日在京向庆亲王奕劻告密说，撰文提出商榷。认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没有八月初四日在北京告密的必要和条件，奕劻亦非接受袁世凯告密之人。袁世凯日后的飞黄腾达，并非慈禧太后对其告密的奖赏。⁴⁴⁾ 孔祥吉则利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所刊布的蔡金台写给李盛铎的两通密札，结合其他

41) 张勇：《康有为的“作伪”及其限度——以康氏戊子乡试自述为例》，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42) 茅海建：《“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载《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

43) 房德邻：《维新派“围园”密谋考——兼谈〈诡谋直纪〉的史料价值》，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44) 房德邻：《维新派“围园”密谋考——兼谈〈诡谋直纪〉的史料价值》，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档案和文献资料进行考释，具体考察了袁世凯通过荣禄“电庆邸达之”向慈禧告密而引发戊戌政变的全过程。从而认定，袁世凯无疑是告密的元凶，他在戊戌政变中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⁴⁵⁾ 随后，赵立人撰文提出新证，指出有的论者以“八月初六日上谕”未提“围园”、谭嗣同为据，推断慈禧发动政变时尚未获悉袁世凯告密内容，因而未缉捕谭嗣同，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所致，这个说法值得商榷。经过考证，所谓“八月初六日上谕”纯属子虚，它不过是《东华录》根据崇礼八月十一日奏折中引用的慈禧八月初六日口谕部分片断“补作”的。根据谭嗣同信札，在政变发生的当天，他即已被捕，说明慈禧初六日口谕中的搜捕目标除康有为兄弟外，还应包括其他康党要员。不过，袁世凯的告密仅是政变的导火线，而非决定性的原因。⁴⁶⁾ 随着“新史料”的发掘和利用，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二) 关于立宪运动与宪政改革研究

关于宪政改革的总体研究。高旺的《晚清中国的政治转型——以清末宪政改革为中心》⁴⁷⁾一书，从政治学的视角，将清末宪政改革置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坐标系中，通过对官制改革、地方自治、政治参与、宪政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具体考察，并与日本明治维新相比较，论述了清末宪政改革的成败得失，及其对晚清中国政治转型和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影响。

关于谘议局与资政院的研究。耿云志对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的来历，尤其是该联合会第二届会议的内容及其政治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

44) 刘路生：《戊戌政变袁世凯初四日告密说不能成立——兼与郭卫东先生商榷》，载《清史研究》2005年第1期。

45) 孔祥吉：《蔡金台密札与袁世凯告密之真相》，载《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46) 赵立人：《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关系新证——以谭嗣同被捕时间为中心》，载《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为第二届各省谘议局联合会是大多数议员及其所代表的立宪派在政治上与顽固的清朝廷开始决裂的一个征兆，是清朝统治的政治基础开始塌陷的一个重要标志。⁴⁸⁾ 刁振娇则以江苏谘议局为例，考察了清末地方议会制度的理想与实验，及其成败得失。⁴⁹⁾ 王开玺撰文，论述了资政院中的立宪派议员的议政活动及其策略、历史局限、地位与作用，认为他们与其他立宪派相比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虽然立宪派议员提出的许多议案没有得到实施，他们关于实行立宪制度的主张也因而没有能够实现，但是这些议案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具有进步意义。⁵⁰⁾

关于地方自治的研究。马小泉著《国家与社会：清末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⁵¹⁾一书，从社会政治结构和政治发展的角度，系统地考察了清末地方自治运动，尤其着重考察了清政府在地地方自治问题上的政策与措施以及清末地方自治在中国早期地方政治现代化历程中的地位 and 影响，有助于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和宪政改革的认识与理解。

驻外使节是推动清末宪政改革的一股重要力量。祖金玉考察了驻外使节的立宪主张，认为他们为清廷谋划的宪政方案大致为日本式的二元君主制模式，就立宪层次而言，无疑是保守的，低层次的；但他们的政治态度则十分激进，始终坚持速行宪政论。结果，其政治态度的激进性超越了改革方案的保守性，使他们最终走到了清廷的对立面。这表明中央政府的信任危机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思想分化，是宪政改革失败与清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⁵²⁾

开放党禁案是清末立宪运动的重要内容，以往的研究主要是在叙述

47) 高旺：《晚清中国的政治转型——以清末宪政改革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7月版。

48) 耿云志：《辛亥革命前夕的各省谘议局联合会》，载《福建论坛》2002年第2期。

49) 刁振娇：《清末地方议会制度研究：以江苏谘议局为视角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版。

50) 王开玺：《论资政院中的立宪派议员》，载《史学集刊》2003年第3期。

51) 马小泉：《国家与社会：清末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版。

资政院议案时有所涉及。唐富满、曾庆军撰文，简单地勾勒了清末开放党禁案的历史过程。作者具体分析了革命派、立宪派、地方督抚实力派以及清政府等各种政治势力，在开放党禁案问题上所进行的各种较量，揭示了各派政治势力复杂的政治性格以及近代中国宪政道路的艰难历程。⁵³⁾

(三) 关于清末新政研究

清末新政是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近年来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崔志海撰文，对于国外学者研究清末新政的英文著作，作了系统的介绍，⁵⁴⁾为国内学界了解国际学术状况提供了一个基础。

清末新政时期，停废科举是一项影响近代中国至为深远的重大决策。关晓红撰文认为，清末新政时期停废科举的决策过程，反映了清末政情的一个重要特征：各项新政虽自上而下地通过朝廷政令颁行，其决策过程却往往由地方促动中央，即疆臣互相串联沟通，以设法联络及鼓动枢要。由疆臣合力而枢臣同声，成为新政改革的重要模式之一。它与社会革新势力的舆论宣传及活动互为呼应，造成科举变革的合适环境。科举停废的影响至为深远，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的观念、习俗乃至乡村士子的生存状况和发展道路，仍有必要进行实证研究。关晓红以刘大鹏、朱峙三两位乡村士子的日记为基本史料，用比较的方法，具体考察了科举停废对士人命运与乡村社会的实际影响，对于所谓科举制度废除与四民社会解体及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观点提出修正。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士”阶层，在社会结构里虽随科举停废而消失，但众多士子却在诸多渠道中经过重新分化组合，而继续掌控着各种权力资源，占据社会权势的重要位置。⁵⁵⁾

52) 祖金玉：《清末驻外使节的宪政主张》，载《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54) 崔志海：《国外清末新政研究专著述评》，载《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

55) 关晓红：《科举停废与清末政情》，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载《历史

清末新政时期中央机构改革过程中设立的新部门，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关晓红对于学部的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该书对于学部的渊源流变、机构设置、职能权限、人事关系、经费筹措与管理制度的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着重论述了该部在发展近代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及社会政治变革方面的作用。⁵⁶⁾ 苏全有则对邮传部的成立背景、官制、机构、经费、规章管理、职掌等制度层面作了系统研究，重点论述了该部在发展中国交通事业和回收利权方面的事功，尤其是对其政策决策作了深入检讨和重新审视。⁵⁷⁾

刘增合以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为清末新政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该书着力探讨了晚清鸦片税收的变动趋势及其对新政改革的重大影响，深入分析了鸦片禁政与清末新政之间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并且力图从中透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揭示清末政治经济问题的复杂性，深入理解剧烈变动的社会矛盾。⁵⁸⁾

关于地方督抚与新政的研究。关晓红撰文，论述了两广总督陶模关于废科举、裁宦官、设议院、变官制等方面的新政主张，及其对清末新政的影响。⁵⁹⁾ 李细珠以制度变革为切入点，着重考察张之洞对清末新政时期各项制度变革过程中清王朝中央决策的参与及其影响，并以张之洞在湖北所推行的具体改革作为新政政策实施的例证，以动态地观察清末新政从决策到实施的全过程。作者充分利用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所藏的“张之洞档案”，以及其他相关史料与著述，从一个侧面细致地勾画出清末新政时期各项制度变革的历史画卷。⁶⁰⁾ 张海林则把端方作为清末渐进主义改革派代表人物，系统地论述其新政思想与实践，是督抚与清末新政研究的又一实例。⁶¹⁾

研究》2005年 第5期。

56) 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 9月版。

57) 苏全有：《清末邮传部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 8月版。

58) 刘增合：《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三联书店2005年 5月版。

59) 关晓红：《陶模与清末新政》，载《历史研究》2003年 第6期。

60)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10月版。

61) 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1月版。

革命与改革并行，是清末最后十年的时代特点。对于留日学生革命性的一面，国内外研究者一直给予特别的关注，而对留日学生在清末新政中的作用，尤其是他们在规划各项改革中所发挥的作用，则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尚小明通过具体考察留日学生在清末筹备立宪、教育改革、新军编练、法制变革等方面的种种活动，充分肯定了留日学生对中国政治、教育、军事、法制等方面的近代化有着积极的贡献。⁶²⁾

迟云飞对于清末新政时期的平满汉畛域问题作了专门探讨。清政府在推行新政及预备立宪的大环境下，实行了平满汉畛域的措施，主要内容有四项：一是准许满汉通婚；二是任官不分满汉；三是旗民编入民籍和筹旗人生计；四是司法同一。在这些措施中，第一、四两项实行较彻底；第三项东三省实行较彻底，而其他地方由于各种困难和缺乏决心，只取得较少成绩；至于第二项，地方官特别是东三省改制后的地方官，多任用汉族人，而中央核心层，仍由满族亲贵控制。宣统年间，平满汉畛域的措施推行趋缓，尤其出现“地方平而政权中枢不平”的局面，这种情形，加剧了社会的不满和清廷的覆亡。⁶³⁾

清末新政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不少，其中关于边疆地区的新政研究更是薄弱环节。赵云田在发表相关研究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出版《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一书，对于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在清末新政时期关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举措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并为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⁶⁴⁾

62) 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63) 迟云飞：《清末最后十年的平满汉畛域问题》，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

64) 赵云田：《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三、制度史研究的加强

以典章制度的渊源流变与结构功能为研究对象的制度史研究本是政治史研究的重点内容。但是，自从学界一度主要关注若干重大政治事件的事件史研究路径大兴之后，制度史研究渐趋式微。如今，当事件史研究有由成熟走向衰落之际，便有回归制度史研究之势。上述一些关于清末新政与宪政改革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制度史研究的实例。

（一）关于官制与行政制度研究

艾永明具体探讨了清朝文官制度的渊源，文官的选拔与任用，文官的权利和义务，文官的行政奖励、处分和监督，文官的休致，以及清朝文官制度的基本原则与实施情况，及其其在法制史上的进步意义与价值。⁶⁵⁾ 稍感欠缺之处是，该书主要着重于清朝文官制度基本结构的静态描述，而对该项制度的流变尤其是在晚清时期的相关变革情形关注不够。其实，此项后续研究当是晚清制度史研究颇有价值的课题。肖宗志以晚清候补文官群体为研究对象，以候补文官与晚清政治的互动关系为基本框架和主线，系统分析了晚清候补文官群体的基本状况与活动，及其对晚清政治的影响。⁶⁶⁾

邸永君对清代翰林院制度与满蒙翰林群体的研究的著作，也应引起学界的注意。《清代翰林院制度》全面研究了清代翰林院制度的渊源流变、基本结构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的深刻影响，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清代翰林院制度的专著。⁶⁷⁾《清代满蒙翰林群体研究》则在全面系统研

65) 艾永明：《清朝文官制度》，商务印书馆2003年 12月版。

66) 肖宗志：《候补文官群体与晚清政治》，巴蜀书社2007年 6月版。

究清代翰林院制度的基础上，对不同阶段、不同类别、不同领域、不同旗籍的满蒙汉军翰林群体成员的出身、功名、经历、境遇、结局和历史地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⁶⁸⁾

刘伟从晚清督抚制度的起源与发展、督抚的群体特征、督抚与晚清改革，以及督抚在财政、军事、外交上的权力变化等方面，系统考察了晚清督抚制度变迁及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的轨迹，认为晚清督抚权力扩张带给近代社会最深刻的影响，是造就了地方主义势力，它不仅成为清王朝覆亡的重要因素，而且直接影响到民国初年的政局和辛亥革命的结局。⁶⁹⁾ 贾小叶由督抚与近代中西文化的关系切入，系统考察了晚清督抚文化观念的演变、外交思想的变迁，以及督抚与《马关条约》换约、戊戌维新、清末新政、近代教育变革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揭示了督抚在晚清大变局中充当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实际操作者的历史角色。⁷⁰⁾

关于州县行政改革的研究，魏光奇撰文认为，清代州县行政在官员任用考核、机构设置、财政制度等方面存在诸多弊病，表现出欠缺合理化的前近代性质。晚清时期，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对此提出批评意见与改革建议，基本被清政府所接受和采纳，使晚清州县行政改革迈上合理化、法治化的轨道，对中国州县行政的近代化起到了促进作用。⁷¹⁾ 关晓红系统探讨了清末州县考绩制度的演变历程及其成败得失，这是以往学界较少论及的问题。⁷²⁾

关晓红有关督抚衙门结构与官制变革的系列论文值得注意。随社会变动与政治格局变化，晚清督抚衙署房科结构日趋复杂。其新旧杂揉的特征，与文案处及文案委员的出现相辅相成，既反映出近代行政职能扩

67) 邱永君：《清代翰林院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版。

68) 邱永君：《清代满蒙翰林群体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

69) 刘伟：《晚清督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70) 贾小叶：《晚清大变局中督抚的历史角色——以中东部若干督抚为中心的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6月版。

71) 魏光奇：《晚清的州县行政改革思潮与实践》，载《清史研究》2003年第3期。

72) 关晓红：《清末州县考绩制度的演变》，载《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

展和业务细分化的趋势,奠定了1907年外官改制的重要基础,同时亦表明变化中的旧式督抚衙门已渐具近代省级政府的雏形,成为从传统幕府转向近代职官制的重要过渡。有清一代,行省最高权力中心督抚衙门的行政运作和结构演变,经历了从私人性质的非正式组织,至正规行政体制建构的重要转变。这个过程至少应分为幕府、文案处和幕职三个阶段。清季新政的外官制改革,以借用唐宋幕职为形式,通过分科治事体现了近代科层制精神,将体制内外机构整合改造,使幕友成为职官,并设会议厅议政决策,其建置反映了清季内外官制改革的成果,在行省机构从传统官制向近代行政体制过渡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这一变化过程表明,清末政制的转型,决非单纯移植西方制度,而是社会变动与实际需求内在潜因促动下,逐渐突破旧有规制束缚,部分借鉴原有体制中的其他形式,以表达新的政治诉求,不断导致职能转变与内容更新的结果。清末直省会议厅的设置,标志着行省政务决策模式由督抚独断和幕友私人参谋向近代行政合议制的转换。清末新政官制改革所反映出来的中西行政概念差异,以及围绕会议厅规则的几番变异,展示出近代政治制度变革进程的艰难与曲折。清季官制改革启动前,程序和步骤均有不同方案,选择结果对改革进程不无影响。当朝执政未能统筹全局,却照搬外国经验,从而内外官改制难以协调,督抚的双重身份又成为官制改革的症结及矛盾焦点。因改制权力频受削弱的督抚,设法图存扩张,由此引发的权与利的争斗,加速了清王朝垮台。所遗留的省级行政权力及其长官身份地位问题,成为民初割据纷争要因,且依然困扰着后来行政体制的规划者与建设者。⁷³⁾

在关晓红研究的基础上,彭剑对于清季外官制改革中的幕职分科治

73) 关晓红:《晚清督抚衙门房科结构管窥》,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清季督抚文案与文案处考略》,载《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从幕府到职官:清季外官制改革中的幕职分科治事》,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独断与合议:清末直省会议厅的设置及运作》,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种瓜得豆:清季外官改制的舆论及方案选择》,载《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

事问题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他认为，清季预备立宪期间负责官制改革的中央机构，先后有编制馆、考察政治馆、宪政编查馆和内阁法制院。1906年起草外官制两种方案的是编制馆，起草《拟设督抚衙门幕职说帖》的可能是编制馆或考察政治馆，而非宪政编查馆。督抚衙门幕职分科治事制度的确定，经历了如下阶段：比较符合立宪原则的外官制第一种方案遭到各省督抚抵制后，编制馆或考察政治馆在《拟设督抚衙门幕职说帖》中提出设立幕职“分曹治事”作为挽救，编制馆根据说帖在《直省官制总则草案》中拟成“分曹治事”的条文，经修改，成为《各省官制通则》中的“分科治事”条文。《直省官制总则草案》是清季外官制改革中的一份重要文献，对于准确理解幕职分科治事、会议厅的设置、地方行政区划等晚清制度变革颇有助益。⁷⁴⁾

清末中央官制改革中官员的俸禄制度改革，是以往学术界较少关注和研究的问题，鞠方安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文书及其他材料，对此作了探讨，具体分析了宪政编查馆制定的《官俸章程条议》和学部官员的俸禄变化情况。⁷⁵⁾

(二) 关于法制研究

借鉴与移植西方近代法律制度，是晚清法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张德美对晚清法律移植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系统地探讨了晚清法律移植的背景与原因，并从法理移植、司法移植、立法移植三方面对晚清法律移植的具体实践进行了全面论述。⁷⁶⁾ 王健以西方法律词语的输入及其对中国法律新词影响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晚清时期与

74) 彭剑：《清季外官制改革中幕职分科治事补证》，载《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

75) 鞠方安：《清末官制改革中官员的俸禄改革》，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76) 张德美：《探索与抉择——晚清法律移植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重大法律翻译事件的若干问题，如西方法输入中国的条件、输入模式及其变化、翻译西方法律词语的方法与特点、日本与中国在摄取西方法概念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以及日本化的西方法律词语流入中国的途径及其对建构中国近代法的重大影响等方面。⁷⁷⁾ 这些均有助于认识晚清西方法的输入与中国法律近代化问题。田涛则具体考察了西方近代国际法在晚清的输入历程及其影响，描述了晚清知识界对国际法的认识历程，以及国际法对晚清外交实际影响的诸多面相。⁷⁸⁾

卞修全考察了清末立宪思潮盛行的原因，及其兴起、发展、高涨并与民主革命思潮并轨的过程，分析了立宪思潮对清末制宪、修律与司法制度改革的推动作用。⁷⁹⁾ 赵晓华对晚清讼狱制度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在分析晚清讼狱制度运行的社会背景的基础上，从积案、待质、京控、狱政、刑讯及讼狱制度影响下的社会心理等方面阐述了晚清讼狱制度的严重危机，认为讼狱制度在晚清的运行状况深刻地说明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实现必须依赖于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⁸⁰⁾

尤志安从中国刑事诉讼制度近代化的角度，系统论述了清末刑事司法改革的原因、过程和影响，认为在中西方诉讼冲突等复杂背景下，清政府开始了近代化的刑事司法改革，建立了近代刑事司法机构，制定了近代刑事訴訟法典，引进了近代刑事訴訟法学理论，为中国刑事诉讼制度近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⁸¹⁾ 吴泽勇详细考证了清末《刑事民事诉讼法》的修订情形及其相关问题。⁸²⁾ 李启成则具体研究了晚清各级审判厅成立与运作的过程，从程序与实体两方面分析了各级审判厅对传统司

77) 王健：《沟通两个世界的法律意义——晚清西方法的输入与法律新词初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78) 田涛：《国际法输入与晚清中国》，济南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79) 卞修全：《立宪思潮与清末法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

80) 赵晓华：《晚清讼狱制度的社会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版。

81) 尤志安：《清末刑事司法改革研究——以中国刑事诉讼制度近代化为视角》，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版。

82) 吴泽勇：《清末修订〈刑事民事诉讼法〉论考——兼论法典编纂的时机、策略和技术》，载《现代法学》2006年第2期。

法审判制度的突破，分析了各级审判厅在运作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⁸³⁾张从容则对清末司法改革过程中法部与大理院关于司法独立、政治资源重新分配、相互职能分工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法部与大理院之间的权力斗争，提出了司法行政权与司法审判权分立的问题，挑破了集权体制下“司法独立”的面纱，揭露了由司法行政机关对司法审判机关进行制约从而实现集权的企图，将司法改革推进到审判独立这一层次，并为日后的改革设定了一个较高的基准⁸⁴⁾。

学界以《清史稿》为依据，对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及战后就地正法的情况做了初步的记述和论证，一致认为就地正法之制始于镇压太平天国时期。王瑞成撰文认为，就地正法是在晚清引起广泛争议的重大司法问题。但就地正法之制并非始于晚清，而是清代刑事审判制度的组成部分。从清代刑事法律制度运行看，施行就地正法不可避免，但这项失去有效司法监督的应急性死刑审判制度，存在随意性和扩大化等诸多弊端，尤其是在晚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持续施行，引起死刑审判复核监督制度与就地正法制度之争，及中央与地方司法审判和监督的权力之争。争论的结果是，尽管最终限制了就地正法的实施范围，但直到清末法律制度根本变革前，这一问题并未解决。⁸⁵⁾

屈春海探讨了清末司法改革过程中以往较少为人注意的皇族司法制度改革问题。通过具体分析宪政编查馆编订的《宗室觉罗诉讼章程》和宗人府律例馆由《宗人府则例》修订而成的《宗室觉罗律例》等文献，认为皇族司法制度改革在吸收西方国家的诉讼原则，特别是参考日本皇族民刑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一整套新的宗室觉罗诉讼制度。⁸⁶⁾

83) 李启成：《晚清各级审判厅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版。

84) 张从容：《部院之争：晚清司法改革的交叉路口》，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

85) 王瑞成：《就地正法与清代刑事审判制度——从晚清就地正法之制的争论谈起》，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

86) 屈春海：《清末司法改革对皇族司法制度之影响》，载《历史档案》2001年第2期。

(三) 关于军制与海防制度研究

关于晚清军制的研究。刘伟具体研究了晚清各省防勇的发展演变情况，说明防勇已成为晚清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战争和地方治安中起了重要作用，随着它的发展，还随之出现了各省的军政和后勤机构，这是晚清地方督抚权力扩大的重要表现。⁸⁷⁾ 龙盛运则专门探讨了咸同勇营军史研究中的“偏荣偏枯倾向”问题。认为在咸同勇营军史研究中，长期存在偏重湘、淮军，忽视其他勇营军的倾向。这虽然有着复杂的主客观原因，但对咸同内战全局，乃至湘军发展过程的全面了解，都是极为不利的。⁸⁸⁾ 贾熟村专题研究了太平天国时期的粤勇，弥补了以往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⁸⁹⁾

关于八旗驻防制度的研究。定宜庄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⁹⁰⁾一书，是在旧著上修订再版，仍为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该书系统论述了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的起源、规制与布局及其驻防体系的建立与完备，八旗驻防的统治机构及其将领与兵丁，八旗驻防与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八旗驻防所反映的民族关系等问题。但时段上主要限于清代中前期，至于八旗驻防制度在晚清的流变以及晚清驻防旗人的生计与满汉民族关系等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关于海防制度。王宏斌关于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的研究著作值得重视。⁹¹⁾ 该书着重研究了晚清海防的两个重大问题：海防思潮与军工修造制度。在思潮研究方面，该书第一次将晚清海防思潮划分为六次高

87) 刘伟：《晚清各省的防勇》，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88) 龙盛运：《咸同勇营军史研究偏荣偏枯倾向试论》，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

89) 贾熟村：《太平天国时期的粤勇》，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90) 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7月版。

91) 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12月版。

潮，并充分注意朝野两个群体的认识，以及海防论争思潮对于清廷海防政策调整的影响。在制度研究方面，该书主要探讨了福州船政局的技术移植情况，行政管理体制的利弊，工薪制度、会计和稽核制度的得失。此外，还附带分析了清政府关于民用轮船管理制度的条例制订过程，指出这种条例规定不仅阻碍了中国商船运输的近代化步伐，而且对于军用舰船的技术发展也有不利影响。

四. 几个新的研究趋向

纵论中国近代史研究，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经获得新生，那么，90年代便开始了一个学风的重要转向。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20世纪9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的时代，学术界的时尚已不再以谈论思想的新奇为高，而以论‘学术功底’为尚⁹²⁾。”如果把这理解为一个学术研究风向的转轨，那么，其趋向实证的结果可能会更加切合学术本身理性、深沉的品格，而使学术研究获得真正的发展。新世纪以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正深受此种流风余韵之影响。回顾及此，有以下五个值得注意的新趋向：

其一，总的趋向：从宏观论争到微观实证。20世纪80年代基本上是一个拨乱反正的时代，学术上也是如此。学界盛行翻案风，往往因历史评价问题争论不休。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模式化，试图通过运用某一种理论模式概括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解释普遍的历史现象，描述历史的基本进程，甚至预设历史必然的发展方向。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由50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发展到80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论争，曾经热闹一时。但在此之后，学界便渐趋沉寂，学风也渐趋理性、实证。例如，对政治人物，已

92) 马勇：《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较少争论其阶级属性，而较多探讨其具体作为；对政治事件，已较少争论其性质与意义，而较多探究其原因、过程与结果；对政治群体、组织与制度，已较少争论其政治属性问题，而较多考察其渊源流变与结构功能，等等。

其二，研究领域转向：从革命史转到改革史。这是学术研究范式转换与时代变迁相契合的明显表征。革命史范式淡出，现代化范式凸显。研究的视角从下层革命活动转向上层政治行为，较多地关注统治阶级的群体结构及其政治活动，戊戌变法、立宪运动与清末新政成为研究重点，而对以往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领域如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等，有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相关的边缘研究的趋势。

其三，研究时段下移：清末新政成为热点。与近代史学界近年来的基本研究趋向相一致，晚清政治史研究在时段上也有下移的趋势，清末新政成为研究的热点。清末新政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制、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改革运动。关于清末新政各个领域的具体研究，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不平衡性：个别问题探讨较为深入，大多数问题的研究显得相当薄弱。这不仅仅是一个论著数量多少的问题，而是一个从根本上缺乏深度的表现。可以说，清末新政研究现在还只是处于一个刚起步的初级阶段：一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另一方面亟待深化研究。

其四，研究视角变换：从事件史回归制度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晚清时期正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制度变革与转型的关键时代，制度变革与转型无疑是晚清政治史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但以往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却相当薄弱。因此，制度史研究可谓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亟待加强而且大有可为的领域。

其五，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关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往长时期内，晚清政治史研究基本上局限在所谓“三次高潮”与“八大事件”，除此之外均被淡化处理。近年来，这种现象已渐有改观。事实上，任何政治事件都不是孤立的现象，政治史的研究当然也不应该

孤立地进行，因此跨学科的研究便显得非常必要。一方面，从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研究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等政治事件，可以获得全新的观察视角；另一方面，走出单纯“事件史”的路径，充分关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及其演变态势，将有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使原本纷繁复杂的历史尽显其丰富多彩的本相。

总之，就学科建设而言，晚清政治史研究已相对成熟而起点较高，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是相当困难的。检视新世纪以来晚清政治史研究的论著，数量不少，但实质性的研究成果不多。在这为数不多的实质性研究成果中，除了研究范式转换等因素以外，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重视实证研究方法；二是重视制度史研究。这种情况，尤其是在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研究方面较为突出。当然，实证方法与制度史研究并不新潮，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只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学术界对此传统有所背离和忽视，而近年来逐渐有所回归与重视罢了。历史学重在求真求实，是一门实在的学问，因而从根本上离不开实证方法；而制度史又是政治史的核心内容，晚清时期是制度变革与转型的关键时期，运用实证方法研究制度变革与转型，将使晚清政治史研究更进一境。